

EC 39/3508

四川沿革

《禹贡》梁州

周：属雍州

秦：巴、蜀二郡

汉：益州

唐：剑南、山南二道

宋：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

元：四川省

明：四川省

清：四川省

民国：四川省

资中县建置沿革

官钧、周嗣荣、钟奇元

资中县位于四川省内江地区西北部，沱江中游，地处东经 $104^{\circ}27'$ 至 $105^{\circ}07'$ ，北纬 $29^{\circ}34'$ 至 $30^{\circ}02'$ 。县境东西长63.68公里，南北宽52.32公里。全县面积1725.08平方公里。东与内江县、安岳县连界；南与威远县、内江县接壤；西与仁寿县、威远县相邻；北与资阳县、仁寿县毗邻。全县辖12个行政区，1个区级镇，2个社级镇，1个县政府办事处，48个场镇，96个公社，778个大队，10个街道居民委员会，6,796个生产队，272,071户，1,146,519人，其中男595,258人，非农业人口86,330人，主要是汉族，另有极少数苗族和回族。县人民政府驻重龙镇，东经 $104^{\circ}51'$ ，北纬 $29^{\circ}46'$ ；位于成都以东，成渝铁路171公里处。海拔高度335米。

一、历代隶属和区划

据《资州直隶州志》、《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等记载，资中县：

唐尧·虞舜时代为梁州域。

周代属雍州。

春秋战国时期为巴地。

秦立郡县，属巴郡。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4年）^{（注一）}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西南夷”，置犍为郡，领县十二：焚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县、牛鞞、南广、汉阳、祁鄢、堂螂。其中的资中即是我县最早的名称。^{（注二）}不过当时治地宽广，今之资中、资阳、内江、荣昌、安岳、乐至、威远，“皆汉资中县地”。属益州。

东汉、三国·蜀汉、西晋（公元25—302年）三王朝时期，与西汉时间，仍名资中县，属益州犍为郡。

成·汉（公元303—347年）统治期，因战乱频繁，荒郡荒县不断出现，境内人户大为稀少，资中县这时也遂荒废。

东晋（公元347—420年）复名资中县，仍隶属益州犍为郡。

南北朝时期：刘宋、南齐（公元420—502年）县名、隶属与东晋同。

宋齐刘裕

梁（公元502—553年）名普慈郡。武帝普通（502—527年）中置。

西魏（公元553—557年）名资州。废帝二年（553年）置。领武康郡。

北周（公元557—581年）名石县。武帝保定（561—565年）中置。这是我县从汉资中县析出单独成县之始，属资中郡，郡上属资州，再上属总管府。

EC39/3508

隋(公元581—618年)仍名盘石县,属资阳郡。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资州的资中郡,仍置资州。开皇七年(587年),由资阳县徙资州来(盘石县)治,遂为州治。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罢州,改置为资阳郡,便为郡治。领县十五: (注三) 盘石、内江、威远、大牟、安岳、普慈、安居、隆康、资阳、隆龛、牟鞬、和义、月山、龙水、根山。其中的月山县即今资中月山公社,龙水县即今资中发轮、枣树公社(旧名龙水桥),根山县即今资中根山镇。此三县均系隋末恭帝义宁二年(618年)置。

唐(公元618—907年)仍名盘石县,属剑南道资州(资阳郡)。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资阳郡复置资州。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资阳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资州。全唐239年中,除懿宗咸通六年(865年)一年间,曾徙州治于内江县外,其州郡治均在盘石县。领县八: 盘石、资阳、清溪、内江、月山、龙水、根山、丹山,其中丹山县(今资阳县铜钟公社)是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分盘石县置。

五代前·后蜀(公元907—965年)仍名盘石县,属资州,为州治。领县八: 盘石、资阳、清溪、内江、月山、根山、丹山。

北宋(公元965—1127年)仍名盘石县,属梓州路资州资阳郡,州郡治地,领县四: 盘石、资阳、龙水、内江。太祖乾德五年(967年)省月山、丹山、根山三县入盘石县。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以盘石县赵市镇隶内江县。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龙水县更名资州,后复故。

南宋(公元1127—1279年)县名、隶属、州郡治地、领县与北宋同。只梓州路更名潼川府路(北宋末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改,南宋仍置)。龙水县于理宗淳祐初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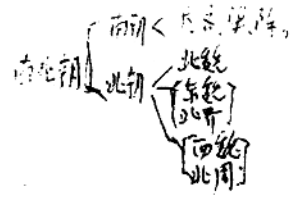
元(公元1276—1371年)资州废,省入简州。从此不再有盘石县名。计盘石县从建置至废除,历北周、隋、唐、五代、宋等朝共七百余年。元末·明(天巧)“大夏”复置资州,属重庆路,州治在今资中县重龙镇。领县一: 内江县。

明(公元1371—1644年)名资县。太祖洪武初,降资州为资县,属四川布政使司成都府。清(公元1644—1911年)名资州。顺治初,仍明制。雍正五年(1727年),升为资州直隶州,属四川省川南永宁道。州治在今资中重龙镇。领县四: 资阳、内江、仁寿、井研。

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名资中县。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改资州为资中县,县治在今重龙镇,属四川省永宁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介石将四川省划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资中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为专员公署所在地(今重龙镇大东街)。领县八: 资中、资阳、内江、荣县、仁寿、简阳、威远、井研。

新中国成立后,公元1949年12月8日资中解放。1950年属四川省川南行政公署内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8年属四川省内江地区。1979年属四川省内江地区行政公署,至今。

建国前,1934年全县划为5个区,6个镇,39个乡,618个保,7,788个甲。建国后,设资中县人民政府。1950年辖7个区,154个乡镇。1951年划为15个区,1个城关区,6个乡级镇,230个乡。1955年选举成立资中县人民委员会。同年划为9个区,1个区级镇,95个乡,5个乡级镇,1,872个村,2,434个初级社。1958年至1957年先后建立2,291个高级社。1958年划为9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67年成立“资中县革命生产管理委员会”,1968年解散,又成立“资中县革筹委员会”。1968年10月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资中县革命委员会”。1978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82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85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88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90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93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95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1998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00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03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05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08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11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14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17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20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23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2025年划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县人委办事处,95个公社,5个公社级镇,49个场镇,779个大队,1,872个生产队。



二、资中名称来历和县城建置

资中县名第一次见于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沿用至南齐（公元502年），它是我县最早使用的县名；第二次见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沿用至今。其名称的来历，系由境内有山曰资山和居沱江（西汉时名沱水）的中游，且城临江滨，故名资中。据《资州直隶州志》载：资山在州西七十里，《清史稿》载：资山在（州）西北，州以此名（清代名资州）。而资山之有名，并以之命名州县，据《资中县续修资州志》记载：“神尧第九子名资。宿老相传，神（资）与禹同（受）命治水，驱蟒有功，遂封于资”。“詹纂《西蜀记外编》亦谓：“尧九子名资，封于此，因名山曰资山，水曰资水。”之故。

县城建置。据《资州直隶州志》载：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始筑土城，西北依山，东南临江，方三里。唐、宋因旧制增修之。宋、元圮。明宏治（公元1488—1505年）间，马拓东北隅，环重龙山，俱甃以石；正德嘉靖（公元1506—1566年）间相继缮治，乙丑（公元1565年）增筑完固。清乾隆辛卯（公元1771年）补修，会停止；嘉庆丁巳（公元1791年）相继督修，始告成功。内外皆用石砌，高一丈五尺，厚一丈一尺，圆遭三里二分三厘，长一千三百六十三丈二尺；垛墙高二尺五寸，马墙高三尺，厚二尺。环城为门者九：正东曰建春，正西曰咸丰，正南曰迎薰，正北曰拱宸，南隅曰通津；余四门規制较小，东隅曰紫气迎薰门，上曰乎波通津门，下曰安澜，再下曰达江。城内有小河，由拱宸门侧穿城入，至紫气门穿城出，两处水门俱栏以铁河。道光二十七年于重龙山后增修内城一段，令外山不得逼城。同治元年，达江门修砌水城，以通汲道。

从以上记载看，此城便是现在的重龙镇所在地。

我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也多。现属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两处，属县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十一处，另专题陆续介绍。此外，对于在人们中广泛流传的三山、六宫、九庙、四观、四岩、八景，现将其名称附录于后：

- 三山：重龙山、衙后山、鼓楼山。（注四）（竹在中大街，即报社、实验小学、文教局所在地）
- 六宫：天上宫、禹王宫、万寿宫、文昌宫、西秦宫、三皇宫。
- 四观：东门高山观、南门火峰观、西门玄天观、北门北斗观。
- 九庙：城隍庙、张爷庙、五显庙、川主庙、老君庙、土地庙、衙神庙、王爷庙、娘娘宫。
- 四岩：古东岩、古南岩、古西岩、古北岩。
- 八景：重龙晴岚、古渡春波、渔灯晚照、珠江夜月、百步云梯、盘峰暮雨、北田秋月、灵岩泉韵。

注一：朝代后括号内的公元纪年是照用的《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上的纪年。

注二：《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一第六页“资州历代沿革表”中的“秦代”栏下，有“资中县”。现注出，与西汉开始见资中县名之据同时并存。

注三：政区治地隶属关系是州郡领县。为使历史沿革交待更为详尽清楚，盘石县为州郡治时，其州郡所领之县，也便同时录列于后。

注四：此处的三山、六宫、九庙系指在城墙以内者，城外的名山、宫、庙则未计入。

资 音 zhōu 全用砖砌，圮：音匹，倒塌。游：音姚。

一九四七年资中蔗农事件

周嗣荣 卢荣安

资中是我省主要产糖地方之一，种植甘蔗是蔗农主要的衣食来源。抗日战争期间，糖税几经变革，蔗农受害越来越深。开糖房、漏棚的地主资本家为了剥削农民并转嫁其纳税负担，极力压低糖清价格，使蔗农利益大受损失。另外，他们还通过向蔗农买青山的残酷手段对蔗农进行超经济的剥削。正如古诗所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农民遭遇的悲惨，不难想见。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建国前资中曾发生过多起蔗农事件，如一九四二年冬天蔗农殴打资中食糖专卖局局长李锡勋，一九四三年夏天蔗农捣毁球溪镇食糖专卖业务所，都充分表现了蔗农对当时食糖专卖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一九四七年元月八日蔗农捣毁资中县政府和警察局的事件，更反映了蔗农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精神。

下面简单地谈谈这次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事件的起因

按照规定，每年评定糖价时，资中派代表去内江，参加内江糖业联合办事处的磋商，回县后再经资中蔗糖评价委员会讨论决定，然后由资中县政府公布。一九四六年十月，资中派去内江商议糖价的代表陈克壮、周仲元等人，他们都是代表漏棚利益的，当然要把糖价压得很低。赴内江的议价代表回县后，县长游伯镛没经召开蔗糖评价委员会径将糖价公布。按照惯例，评议糖清价格时，系以当时白糖市价的二分之一（即所谓糖清半价）剔出国税为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一九四六年的糖价，每万公斤糖清应为一千零八十万，但内江糖业联合办事处却定价为八百三十万元，使蔗农利益大受侵害。因此广大蔗农众议沸腾，群情激愤，都要奋起进行斗争。县农会理事长李传瑞到县府请求增价。游伯镛认为糖价变动牵动全县，不予照准。后来李传瑞等又到县府请愿，表示糖价不变也可以，但蔗农给糖房的烧缴费（包括熬糖烧缴费和人、牛工食用费等）和卖青山的预支款的利息应当减少。游伯镛认为烧缴费和利息可由产制双方自行解决，县府不管。因此资中糖价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稍为合理的解决。

事件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元月八日上午九时，怒不可遏的蔗农数百人愤怒地拥至县府请愿，先把糖价布告撕毁，然后进入大堂质问。游伯镛见蔗农人多势众，吓得翻后衙墙逃跑了。蔗农见问题

无从解决，硬把大堂上的匾额打烂，并冲入警察局，捣毁了一些什物。于是军警大批出动，镇压群众。县保安司令刘宗岳亲自指挥，在鼓楼坝、金带巷、后街等地方警戒。鼓楼坝的军警向蔗农开枪，当即打死一人，重伤三人。接着县农会理事长李善功、王子山，理事何衡九、陈有余（这些人打着代表农民利益的幌子，实际上是利用这次减价问题捞取政治资本）和一些蔗农共六十八人被县府逮捕，关了一段时间，移送内江地方法院。与此同时，资中专署、县府串通县参议会，捏造事实，上报省府，诬称奸民作乱，捣毁官所，借以推卸罪责，邀功请赏。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时资中专区是四川省第二专区）专员田伯施于一月、二月先后贴出两张布告，都诬称这次事件是有奸人煽动。一月的布告说：“……此种情形，决非我善良农民所能出此，其间显有奸人从中鼓惑。”二月的布告说：“查资中部份农民于上月八日当蔗糖价值双方妥议签约之后，为奸人煽诱，利用机会，造成暴动，捣毁县府警局，掳劫公私财物，行同盗匪，实属不法已极。”所以他要“查明鼓惑奸民及倡导暴徒，严行惩办。”后来内江法院以“纠众肇事”的罪名判处了黄应清、刘官洪、肖述尧、黎龙泉、何衡九等五人一年又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判处了年仅十七岁的何治国一年的有期徒刑，其余的人关了一段时间才释放。

这次事件传开之后，资中旅京（南京）同乡会和南京六个大专院校的资中同学会发出了《为资中蔗农血案呼吁代电》，揭露了专、县政府的罪行，并提出五项主张：一、请政府从速查办祸首田伯施、游伯镛，并严惩开枪射击之警察及保安队；二、罢免县参议长林云根等，并追究其责任；三、从优抚恤死伤蔗农，立即释放被捕者；四、重新议定糖清合理价格；五、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资中旅蓉同乡会也在《新新新闻》和《建设日报》上发表代电，为受害蔗农鸣不平，并予专、县政府和剥削压迫者以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但“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在专、县政府和糖房、漏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情况下，减价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广大蔗农仍然处在残酷的剥削压榨之下，喘不过一丝气来，生活上日益穷苦，生产积极性日益降低。直到解放之后，广大贫苦农民才彻底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一九二七年省六中师生捣毁资中 城隍庙塑象和扩充校舍的概况（注一）

周 嗣 荣

一、“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僻处川南的资中县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封建迷信的旧风习、旧思想也给予了相当大的震撼。

一九二六年初，原“资州中学堂”更名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校”。这年是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日益高涨，日益深入人心的一年。《新青年》杂志、《独秀文存》、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小说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上海刊行的《创造》、《洪水》等文艺月刊，以及蒋光慈、谢冰心、黄庐隐等人的文学作品都为省六中师生们所喜读。大东街省六中校门斜对面茶馆外的墙壁上贴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类的标语。大十字街口墙壁上贴有北伐军前敌总司令蒋介石的布告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段琪瑞”、“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之类的标语。所有这些，都在省六中师生们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资州中学堂”更名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校”后，原资五属（属资州所辖的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等五县）和其他县的一些学生考入省六中读书者增加了许多，学校办公室、教室和师生宿舍俱感狭窄，学校领导、教职工和学生亟欲扩充校舍，解决这一迫切问题。

当时省六中校址在资中县城内大东街（今资中第一中学校址），东与林家（川军师长林碧珊家）毗邻，南为资中县教育局、省六中校门和内操场，北抵城垣，西与城隍庙隔墙，东、南、北三面均无扩展可能。在当时社会上的旧风习、旧思想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省六中师生们对城隍庙虽未即予触犯，但已把它作为扩展校舍的考虑对象，并经常把它作为谈论的话题了。

一九二七年上期开学后不久，在省六中后门下（城墙下）的运动场（今人民广场）上举行了第一次全县学生大会，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大会主席是省六中第三班（注二）学生唐光勋。驻资中的川军师长王瓚绪和省六中校长周能泮（注三）也参加了大会。大会上还喊了如上所述的一些口号。其后不久，又相继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是纪念重庆“三·三一惨案”，一次是纪念“万流轮船惨案”（英国轮船在万县撞沉中国木船的惨案）。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浪潮下，美国侵略者在资中兴办的“华美中学”、“华美女中”读书的男女学生纷纷转学到省六中、联合师范学校（资州所属五县合办）和县立女中校。这样一来，省六中学生愈多，校地愈形狭窄，扩展校地更属刻不容缓，省六中师生们关于划城隍庙为校舍的谈论也就更感兴趣，更为热烈了。

二、捣毁城隍庙塑象，扩充校舍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的一天，在省六中教员楼下的天井中，校长周能泮，教务主任彭百川，教师何坚吾、荣光典（二人都是王瓚绪师部的参谋，在省六中兼课）和全县学生联合会主席唐光勋在一起闲谈，一致认为只有把城隍庙划过来，才能解决校舍问题，但未说到去打城隍菩萨。后来唐光勋和第二班同学张明道、第三班同学曹聪（后名为曹获秋）、蔡太猷、李五福、李斌等人又谈到了划城隍庙的问题，也未谈到捣毁庙中塑象。当时省六中师生虽未考虑到打倒封建迷信的具体作法，但已具有不信鬼神，不怕城隍菩萨的思想基础。

划城隍庙的问题在省六中师生中久经酝酿，越谈越起劲，越热烈，事为王瓚绪所闻，王未表示态度。

要把城隍庙划归省六中，就必须两个难题中选作其一：一是通过和平协商办法将庙内塑象迁走，另立城隍庙；一是采取革命行动，将庙中塑象毁掉。在当时封建迷信思想还相当浓厚的社会环境下，省六中师生都认为采取前一种办法社会阻力太大，根本不能达到目的；

如果把庙中塑象打掉，先造成既成事实，成功的可能性还大得多。随后又复几经酝酿，采取革命手段的思想倾向在一些师生（特别是学生）中就越来越坚定，有些人竟跃跃欲试了。

五月中旬，一天下午课后，唐光勋、曹聪、张明道、蔡太猷、李五福和其他一些第二、三、四班的学生约集在一起，并准备好棍棒绳索，然后一齐跑出校门，涌入城隍庙内，动手大打塑象了。蔡太猷首先爬上神台，用一根大绳子将城隍菩萨的头、身套稳，十多个同学在下面象拔河似地用力一拉，轰隆一声，城隍菩萨被拉倒了。接着同学们就分头将牛头、马面、胖官、小鬼以及十二殿中所有的大小塑象都捣毁了（一些小铜菩萨，学生们则予保全，各自拿来玩耍）。城隍庙内一时尘土飞扬，大小塑象的头颅、肢体和泥、石、竹、木狼藉满地。学生们进入正殿后面城隍娘娘的寝殿打城隍娘娘的塑象时，庙内金司不明究竟，吓得直打哆嗦。一会儿，教务主任彭百川来了，叫把泥石弄到庙对面瓮城子外的河坝中倒了，并动员一些学生来把四处打扫干净。接着经资中县政府批准，将城隍庙划归省六中使用。省六中把城隍庙改作学校礼堂，把十二殿、城隍娘娘的寝殿和庙门内侧的角楼等处改作学生宿舍，校地就比较宽阔，校舍就增多了。

注一：这篇史料是根据我自己的耳闻目睹（当时我在省六中初中第六班读书）和访问唐光勋教授（安徽大学教授，现回川养病，在内江教师进修学院作顾问）写成的。

注二：番号数字标志年级的高低。那时省六中是每年春秋两季都招生，所以第二班比第三班高一学期，第三班比第四班高一学期，余类推。

注三：周能泮校长后为九三学社成员，建国后任成都市教育局长。

一九三七年的省中学潮

王志康

这里所说的省中，就是四川省立资中中学。学校校址是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一年）建立的琼江书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改为资州中学堂；一九二六年改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一九三五再改为四川省立资中中学。

一九三七年的省中学潮，是该校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它是与当时四川政局的变化和省中学生反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的行径交织在一起的。

一九三五年，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经云南、贵州、湖北分路入川，转战各地，势如破竹。四川军阀惶惶失措，急忙呼吁“中央”给予支援。蒋介石旋即派“中央军”入川。

“中央军”入川的前导是“参谋团”。该团成员全系蒋帮“复兴社”的头头和青一色的别动队员。他们入川后，挂出了“国民军训委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牌子，大搞麻痹四川人民的宣传活动。同时，在暑期办“全川学生集训队”，省中高中班的部分学生曾被集训其中。在未经受蒋帮宣传以前的学生们的思想是比较单纯的，遇事总喜欢做旁观者。不少学生一听到风声，就开党训营了。

过训训营的五校学生，由国民党资中县教育官刘多勋、汤辑五（成都人，国民党资中县教育官）主持。

（曾任教育厅第二课课长）结识了不少的中学教师。他这次来省中，带来了一个比较有力的班子，这班人有一套办学经验，也有一手迷人的教学艺术。刘多勋（仁寿人，蒋帮江西星子县军校特训班毕业，复兴社分子，别动队员）也有一套抓学生的手腕。他们上下其手，彼此配合，开学不久，省中面貌为之一变。

四川省主席刘湘，企图遏制蒋介石势力在四川的膨胀，想方设法向蒋帮所把持的机构进行渗透。刘湘凭借他的实力，将其亲信王荣庆派往资中专署接任副司令职务（代替了原复兴社分子陈采夫），把枪杆子抓在手里。

一九三七年春，刘湘又迫不及待地将其在“宪训班”毕业的杨述派来资中接任省中校长，把前任杨辑五“硬宰了”（按一般规定校长的更迭应在每年秋季）。学生对此，大为吃惊，深为经过“西安事变”结成统一战线及勤奋学习的风气被破坏而惋惜；对四川军阀狂叫西南独立，排除异己，撤换校长，破坏学校安宁环境之举，无不怒火中烧。

在杨述接任后的日子里，无论从他本人能力（他从未办过学）和他所带来的一批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学方法上来说，与杨辑五那一班人相比，都大为逊色。因此，大部分学生对杨辑五的调离，产生了怀念之情；而对杨述的到来，颇有厌恶之感。此外，对杨述把过去举行纪念周及每天早、晚的升、降旗典礼的仪式单中加了一条拥护刘湘的口号也很反感。加之，杨述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为刘湘歌功颂德，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的不满。

轰赶教师之风刮起来了。高中三班轰走了代数教师黄光弼；高五、六两班轰走了教师夏××；其他高、初各班对杨述带来的一些教师也进行挑剔、嘲笑及哄闹。杨述气慌了，在一次升旗典礼上，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样闹，一定是有背景的，有人支持的。这不是学潮而是政潮……”这样的吓唬，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学生中传开了这样几句话：我们要求杨辑五回来，如果他不来，文藻清^①来也可以。杨述听了，更为恼火。

教师被轰走不少，每班缺课增多。由于无课可上，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混乱。军事教官刘多勋每天早上照例把全校高中生带领出校跑步训练，跑上二龙山就休息。这时刘多勋也伙同学生一起，大肆议论杨述，并进一步抓紧高五、六两班中能起影响作用的“优生”，准备策动学潮，省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三月份的一个早上，高中四班学生唐富海提前了几分钟去食堂吃饭，被一个训育老师看见，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斥，唐富海受不了，便你一句我一句顶吵起来，接着来吃饭的学生陆续进食堂了，见此情况，围上了一大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其中还有些么喝声、怪叫声，弄得这个训育老师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走了。杨述便借此事小题大作，立即挂牌给予唐富海以记大过处分，还责令其家长来校当众向训育老师陪礼道歉。学生对此更加愤愤不平。

四月三日，初中二十五班有个学生，见无课可上，心中烦躁，便在课堂上发牢骚、骂开了。教务长刘××恰恰于此时走来碰见，冲进门就大骂：“你是共产党，要造反了！”这学生听到这个会招致杀头的诛语，吓得全身发抖地大哭大喊（因为在前年冬天，东门外河边上曾杀害了几个共产党员）。班内也吵闹起来，一齐反对教务长。其余各班学生闻声赶到，门窗上都挤满了，也一齐向教务长起哄。军事教官刘多勋也来了，问明了情况，他讨好学生，扬言说：“乱安诛语这还行吗？我可以带你们去请愿！”学生们齐声回答：“对！我们去请愿。”教务长见此，气急败坏地走了。

刘多勋看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在这天晚上召集一些学生头头开秘密会，布置在深夜写标语，写对联，天亮后罢课。

第四天（四月四日）下午，床号前一夜就轰动了，东一堆西一堆地围住杨述所写的对联。科学馆大门石柱上写的是“科学馆桃李争妍喜时雨新临鸟唱欢歌花呈异味；教员兢兢兢兢开卷入与学子共学共长共励共勉”；食堂墙上的一幅是：“安便驱龙归大海；誓驱麋鹿下春台！”盥洗室外还有一幅：“嗟乎！旗帜已北去；痛哉！狐兔正东来。”人群中还有几个学生大声地指斥杨述的种种不当行径。另外，学校大门外右墙上那幅拥护刘湘的大标语中那个“刘”字，竟被稀泥巴涂抹得完全看不见了。杨述一伙正想出面干预，顷刻之间，全校学生一齐行动，纷纷将自己的箱柜衣物书籍迅速地搬出了学校。不到半小时，全校一空。稻草、纸片、玻璃、碎碗等乱七八糟地撒个遍地，显出一片凄凉景象。

搬离学校的外县、外乡籍学生，分别迁住城区的学生家里躲藏起来，把在学校中穿的制服都换上普通便服，街道上看不见一个省中学生。

大东街的益文书局，是领导这次学潮的秘密指挥所。军事教官刘多勋和各班的头头以及同情学潮的学生家长都聚集于此，写标语、拟传单，印制《告全县父老同胞书》，忙个不停。有的去街头巷尾贴标语、散传单，有的化装去探听学校当局的动向。

杨述着忙了，一面向省府告急；一面又去专署控告。保安副司令王荣庆出动保安队便衣谍查，到处搜捕刘多勋及其他学潮领导人。刘多勋闻讯，立即离开资中回仁寿去了。专员王梦熊（当时是倾蒋的）也专门到各处了解情况，最后，他说：“省中学潮不是共产党搞的，而是由于教师质量太差、杨述处理不当所引起的。”因此，对杨述的控告未予理采，致使学潮持续了下来。

后来，王梦熊感到如果学潮长期闹下去，自己也有责任，便出面进行调解。他召集杨述、学生家长代表张岷泉及学生代表等进行谈判。学生方面提出了六个条件，主要内容是：学校当局保证不开除、不默退任何一个学生；立即解决缺课问题；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杨述全部接受，并由专员王梦熊作出保证。

第二天，满街上贴出了“欢迎学生回校”的标语，学生们才相互转告，陆续搬回学校。经历了二十多天的学潮，虽然暂告结束，但从此以后（截至解放前夕为止）校长变动频繁，学潮接踵而至。

注①文藻清也是教育界老手，曾任省教育厅课长，成都石室中学校长，一九三七年春，也被刘湘撤换。

李罗杨围攻资中片断

张善良

一九三二年，邓锡侯、田頌尧、刘湘、李家钰、罗泽洲、杨森联成一个反对刘文辉的阵营，川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混战，也即是有名的二刘之战开始了。李、罗、杨围攻资中只是战役中的一个序幕。

这年，二十四军驻南充的部队有三旅人，驻遂宁的部队有两个师。二十一军有两旅人进驻南充上游五十里的龙凤场，一个师进驻潼南。南充的左翼为杨森、李家钰部，右侧有罗泽

洲师。李、罗、杨因防地狭小，军饷困难，惟恐天下不乱，遂乘二刘矛盾尖锐，首先由罗泽洲部向南充的李渡场打响了第一枪。混战的序幕便揭开了。二十四军为了缩短防线，集中兵力，自动放弃南充、遂宁等地。北道李、杨等部进驻南充后，当推杨森为四川联军第一路总司令，指挥李、罗、杨等部，向二十四军部队跟踪追击，经过一些小接触，很快进入了资中城。此次战役，在资中县城的北门外、小东门和附城的二龙山、重龙山等处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联军组织敢死队，十元生大洋一人，银元兑现，愿告奋勇者即到敢死队编组，听候冲锋命令，强占要地。不少士兵结果落得人财两空，死无葬身之地。二十四军败退后，北门外死尸累累。杨森为了安葬“忠魂”，给阵亡将士修公墓，立石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语诚不虚传。

资中地处川南，土地肥沃，形势险要，为兵家所必争之地。川战每次爆发，成渝线上必有重兵把守，而资、内尤为要冲。李、罗、杨这次围攻资中，虽然得胜，而资中人民受拉伕、拉兵、派款、征粮之苦，难以尽述。至于地处战线上的民房被占据，庄稼被践踏，钱粮衣物被抢光，老弱妇孺遭残害，更是无法形容的。

资中兵灾见闻

周叔平

一九三二年，战云布四川。刘家两叔侄，争权夺地盘。军长侄名湘，联合李罗杨^①。南攻资中来，军长么爸慌^②。一攻与一守，精神各抖擞。交战十余日，侄胜叔败走。

我乡遥空上，一日怪声响。北来一飞机，横冲谁敢挡。刘湘备战久，海陆空军有。飞机十来架，炮艇二三艘。所谓新武器，重价购不易。万里自欧洲，英法意大利。这架小飞机，本来飞得低。步枪打不中，当然就无敌。飞机向南行，空临资中城。突闻炸弹声，轰隆似雷震。据说炸浮桥，技术欠高超。弹爆沱江里，小鱼死几条。乡人互称庆，今天好幸运。弹若投我村，死人算不定。空军作先行，陆军便紧跟。不到一星期，我乡战祸临。

我乡论交通，资安扼枢纽。河流西向东，纵横岗峦有。大梁山进攻，老尧山防守。忽而争山头，忽而抢渡口。机关枪声停，迫击炮声吼。刺刀猛冲锋，血战小坡陡。深夜步枪响，响有等不久。子弹掠空过，尖叫声发抖。我家战场上，祸难断是否。耳闻心胆寒，目睹魂飞走。

攻守双方军，先后驻我村。左邻和右舍，日夜乱纷纷。各级军官长，一时记不清。要皆威风凛，面目俱狰狞。当官摆官架，官架不嫌大。师旅团营连，五长皆为霸。横眉干坏事，开腔说恶话。百姓受欺凌，士兵挨打骂。官官总相为，胆大包天下。

战后算损失，乡人推叹息。东家损牛衣，西家失斗笠。南邻蔬菜空，北邻鸡鸭遗。屠狗论英雄，樊哙有遗风^③。我乡却侥幸，鸡空犬未空。烧饭拆茅屋，筑壕取门楣。顺手便牵羊，蹊泽尽捕鱼。大片砍甘蔗，万颗摘橙桔。遍山挖红苕，饭菜两相宜。小春豌豆尖，掐来煮汤吃。军官日三餐，饱肠喜宰鲜。肥猪肉要瘦，白米饭要干。烧酒或黄酒，只要农村有。官兵搜得来，大碗喝大口。官长醉昏昏，壮志可凌云。对下发脾气，随便骂二分。士兵冷眼

看，忍气又吞声。因为官是官，所以兵是兵。军阀讲规矩，兵卑官为尊。大鱼吃小鱼，大官压小卒。小鱼吃虾虾。抗民事所必，虾虾吃泥巴。官对民不惜。

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变，中华好几灾，咸思赴国难。爱国蔡将军^③，一二八抗战。抗日守上海，全国人称赞。四川军队多，不下五十万。军阀轻外侮，重在打内战。李罗杨逞凶，邓田刘称雄^④。全川遭战祸，岂惟一资中。

注释：①李家钰、罗泽洲和杨森时称北道将领。②刘文辉弟兄排行最幼，称么爸。③蔡廷锴、蒋光鼐二将军率十九路军与侵犯上海日军血战累月、震惊世界，为全国人民所讴歌。④邓锡侯、田頌尧和刘文辉本来有所联合，但此次邓、田却与刘湘携手打刘文辉。

“本票”风波

熊述纲

“本票”，是解放前银行、钱庄之间办理收交的一种信用票证。由于它可以代替现金使用，虽与钞票的性质有所不同，仅限于本地使用，但因出票行庄要无条件地承担兑付现金的义务，在市场交易和其它债务清结中减少了现金的清点工作，故多乐于使用。尽管“本票”在当时市场上具有方便收交的作用，因受旧社会明争暗夺的影响，资中县城在使用“本票”上出现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不久，货币不断贬值，大额钞票大量出笼，市场物价飞涨，通货量跟不上需要，“现钞荒”重新出现。据当时目击者谢开荣、杨俊臣等同志回忆：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上半年，旧中国银行库存现金告罄，无现钞支付存、汇款，遂发行“定额本票”，面额有壹拾万、伍拾万、壹佰万、伍佰万等，代替现钞在市面流通，由旧中国银行贴出公告，大意是：待现钞运到即行收兑。这批“定额本票”随后虽全部兑回，但在行使过程中，出票银行扩大了信用货币，获得了赚取利息的好处。但因“定额本票”既有地区限制，面额又大，不便找补，一些真正需要现钞的人，只好忍痛“补水”（拿“定额本票”去换现钞，要贴补百分之几的费用）。影响所及，广大群众蒙受了货币贬值和“补水”的双重压榨。

物价继续飞涨，市场通货无法供应。旧资中县银行看到发行“定额本票”大有油水可捞，通过国民党参议会作出决定，由该行在资中县城也发行“定额本票”。事为当时的工商业者察觉，由资中县商会理事长张孟筠召开了紧急会议，商定对旧资中县银行所发的“定额本票”予以抵制，买卖收交，不用该票。据当时目击者罗荣波、钟德坚、王吉光、耿仲修等同志的回忆，旧资中县银行的“定额本票”上市后，在一个“比期”（当时市面流行在每月的十五日及月底两天各办一次银钱收交清结手续，称为“比期”）的前两天，全城各工商业，只有买方，没有卖方，未成交一笔交易。各商店大都关门停售。这场风波引起了物价飞涨。一家姓王的名小食叫“博士元”的汤元铺，每碗汤元原价二千万元金元券，一下涨成一亿元，涨

了四倍。姚德明店上卖的清油，每斤原价六千多万元金元券，一下涨成二亿多元，涨了三倍。弄得怨声载道。县银行见事不妙，邀请工商各业首脑进行协商，并由县参议会出面调停，工商业经不起地方权势的压力和吃“油大”的诱惑，只得承认使用县银行发行的“定额本票”，并答应复业。于是市面恢复正常，这个“比期”的收交才得进行，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在这场风波中，得利者是官僚、地主、投机商，吃亏的还是老实百姓。

资 中 文 庙

王 志 行 杨 祖 凯

出资中县城北门，有一座红墙琉璃瓦、宏伟壮观的古代宫殿式建筑，这就是资中县文庙。它原在城内大东街，清道光九年(1829)移建于此，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是我省保护得比较完整的古建筑。1980年经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名胜词典》中全国游览的胜地之一。

一、文 庙 的 由 来

文庙，也叫孔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祭祀孔子的地方。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也是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由于他的儒家思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他生前虽未得到重用，死后却备受历代君王尊奉，被推崇为“德配天地”、“道贯古今”、“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据史书记载，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就把儒家思想捧上统治地位。至唐太宗时，通令全国各地州县都建孔子庙，这就是县有孔子庙的开始。唐玄宗又把孔子追封为文宣王，改称“文宣王庙”，明以后通称“文庙”。同时，还追封孔子的祖先和后裔，上至五代，下及子孙。此外，自宋开始，又将孔子的弟子和历代名臣、学者尊为“先贤”、“先儒”，列入文庙从祀，并在庙内附设名宦、乡贤、忠孝、节孝等祠，其目的是想用此来麻痹人民的思想，统治和奴役人民。至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保存和丰富了我国的古代文化，以及他所倡导的治学精神、教育方法，至今仍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

由于文庙是封建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而修建的。因此，除建筑宏伟壮观外，其祭祀开放都比其他庙宇严肃。别的庙宇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去烧香拜佛，求神许愿，或者参观瞻仰，游览玩耍。而文庙，在封建时代，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进去的。平时，它也不随便开放，只在春秋祭祀之日或者考试高中回乡进谒、入学游宫等特殊情况时才打开。能够进去拜谒的也只是些统治阶级的官员、士绅和一些举人、秀才、仕子，阶级界线是极为分明的。

祭孔典礼也十分隆重。祭祀那天，阖城文武官员、乡绅、文士都要到齐。祭前要斋戒沐浴，午夜子时齐集大成门内等候，寅时开祭。祭时要供牛、羊、猪三牲（即所谓太牢之礼），献香献帛，唱赞礼，动鼓乐，午八佾（注一），跪拜时要唱名行三跪九叩礼，有一套完整的仪

式，并且要在天亮前祭完。清雍正还通令全国，在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百官应一致前去拜祭，不理刑名，禁止屠宰。以后一直承袭这个规定。

二、文庙的沿革

资中文庙，原在城内大东街，即现一中校址。初建于北宋太宗雍熙年间。到明正统、天顺年间曾重新修建。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公元1542）涨大水，县城被淹，庙被毁。县令孙之谋又把它修复。明末倒塌败坏。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元1684），县令朴怀德改迁于十字街。雍正五年又迁还大东街。乾隆元年及五十六年又进行过两次补修。但旧庙地点低湿狭窄，又当街市，十分嚣闹（当时大东街是由成都到重庆的东大路通道）。因此，道光九年，由州牧张海澜倡议，士绅集资将文庙迁移到北门外南宋状元赵适（字庄叔，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科中魁）居游过的洗墨池处。这次工程前后修了六年，到道光十五年竣工。同治十二年因风雨剥蚀，多有朽烂，本地人士又集资培补，更换华表，淘浚水池，增加周围石栏，粉漆丹堦楹楠，整修内外，焕然一新。光绪二十一年，邑人骆成骧考中状元，回到资中，又捐资四百元进行培修，在泮池上的石拱桥踩桥致兴，以示资中文风之盛。此后到民国三十年（1941）又进行过修补。但不久成了兵营，将里面储藏的桌椅什物大肆毁坏，仅留了几个神龛。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便于保护文物，1955年将文化馆迁来办公，以后常加培补，至今保持旧观。

三、文庙的建筑

文庙是为祭祀孔子而建的，因此，它的结构布局与曲阜孔庙大致相仿，不过规模略小。前后共有四进院落，座北朝南，面积五千多平方米。整个建筑层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变化。主要建筑物灵星门、大成门、大成殿都严格地排列在南北中轴线上，次要的对称分布在东西两侧，稀密有致，内外对应。房顶都用琉璃瓦盖面，翼角屋脊饰有五颜六色的各种珍禽异兽，每当晴日，阳光反射，鲜妍瑰丽，光采夺目。红色宫墙四周围绕，一对月池内外相映，柳枝摇垂，桂树拱立，配上那步步台阶，曲曲回廊，真是古色古香，清静幽雅，不愧是资中的著名古建筑和游览胜地。

文庙全部建筑从“万仞宫墙”开始。墙在外月池南面，原是一堵旁无其他建筑，单独构成的墙。其语出自孔子学生子贡所言：“夫子之墙数仞（仞为古代计量单位，一仞等于八尺）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家之富。”它原是明嘉靖时山东巡抚胡宗缙对曲阜旧城正南门的题词。清乾隆到曲阜祭孔，把胡宗缙写的字毁掉，改写他自己的字，以后各地仿效，在孔庙前一堵高墙，就名“万仞宫墙”，其意在颂扬孔子的学识精深渊博，高达万丈墙垣一样。现字迹剥落，但底座仍依稀可见。外月池内，红墙之外，矗立着两根石柱华表，借以表示文庙的庄严不同一般。文庙前后大门（也称左右大门）外，原有两块高三公尺、宽一公尺，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石碑。文庙大门左曰“义路”，右为“礼门”，取孔子倡导的“义”、“礼”名门，表示这里是讲礼义的地方。中间一堵联系两门，类似“九龙壁”的建筑，名叫“照壁”。壁上嵌有“龙凤呈祥”、“鸾翔鱼跃”等图案，雕塑艺术十分精美。踏进文庙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五座青石牌坊。正中一座名曰“灵星门”（曲阜孔庙此是大

门)。古代传说灵星为天上文昌，以此名门有人中宰相，为国家所用的意思。灵星门前有石阶，台阶以黄色彩砖铺砌成御路，这是仿古代帝王宫殿建筑，以示其尊贵和威严。左

灵星门内是内丹池，名曰泮池。取鲁国公在泮水之滨建造宫室，兴办学校而来。故学宫也叫泮宫。在科举时代，凡童试考中秀才后，要到这里来绕池行走，饮酒吟唱，庆贺入学，称为“游泮”，所以入学也叫“入泮”。泮池正中，有一座三洞石拱桥，桥沿和池的周围均有石栏，桥栏“龙蹲鱼跃”，上缀朵朵浮云，下托山海波涛，形象生动，工艺精致。泮池两侧，左右各有三间房屋，是文庙的附设建筑（详后）。两测还有高四公尺的大石碑各一座，原在大东街旧庙。道光九年迁庙时移置于此。其碑文，左面那块是明宪宗成化年间书刻，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右面是康熙手书的《四书·大学篇》，距今也有二百八十多年。两碑字迹清晰可辨，有书法研究价值，是比较珍贵的文物。从大成门（又名戟门）进内，是文庙的主要建筑。大成门一排五间，门名取孟子说的：“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语意。其建筑黄瓦飞檐，彩绘雕刻，下铺石雕须弥座台基。门前台阶中央原与灵星门前一样，为浮雕龙陛。旧时大成门只逢祭孔大典时才开，平时都从两旁的金声（左）、玉振（右）二门出入。文化馆移来后，1970年将浮雕龙陛改砌成石阶，以便于群众参观。

大成门里面，左右两侧各有角楼一座，左吊铁钟，右架皮鼓，名曰“钟楼”、“鼓楼”。旧时举行祭孔盛典，在此鸣钟、击鼓，吹奏动乐。由此进内，东西长廊各有庑殿五间，琉璃盖顶，鱼兽饰脊是配享“先贤”、“先儒”的场所。根据光绪时订正的资料，以前东庑祀“先贤”四十人，“先儒”三十八人。有孔、孟的弟子和葛亮、韩愈、周敦颐、程颢、文天祥、方孝儒、黄宗羲、陆陇其等。西庑祀“先贤”三十九人，“先儒”三十七人，除孔孟弟子外，有董仲舒、陆贽、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张载、程颐、陆秀夫、王守仁、顾炎武等。

由大成门正中，通过一个宽敞的院落，登上东西两庑夹峙的，中央有一个两层石栏环绕的高台，是文庙的主殿——大成殿。唐代称文宣王殿。宋徽宗赵佶尊崇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改名为大成殿，至今沿用。这是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物，在文庙的最高处，显示了它突出的地位。殿下筑有大型须弥座石台基，殿高二十米，宽二十五米，重檐三脊，黄瓦朱甍（注二），中间主脊浮雕双龙戏珠，鳌角冲天，真是巍峨宏丽，气象庄严。殿内有八根直径八十公分的原木大柱，其下均垫以覆盆莲花宝座柱础。殿前露台宽敞。旧时祭孔，八队舞乐就在这里歌舞。台下铺陈面雕螭首，周围筑有白石雕栏，石阶层列，复道四通。正中还有两道浮雕龙陛。建筑设计精致严密，艺术价值很高。殿内正中上方悬“至圣先师”横匾，中间一座高大神龛，原祀有孔子石像。左右两旁，一正一侧相对各有一座神龛，配享有四配（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十二哲（闵子骞、仲弓、子贡、子路、子夏、有若、冉耕、宰予、冉求、子游、子张、朱熹）的牌位。

在大成殿的左后方稍低处，有一所独立的院落，是从祀孔子父祖的崇圣祠。进门绕过回廊。一排三间堂屋，除配祀孔子的父祖五代外，还祀有四配和周敦颐、朱熹等父亲的牌位。

另外，文庙里还附有名宦、乡贤、忠孝（包括昭忠祠）、节孝四祠，是文庙的附设建筑。名宦祠在大成门外泮池右侧，一排三间，里面供祀的是在资州做官，有政绩留有声名的人，如唐节度使韦皋、刺史羊士谔、龙水令范祖禹、县令孙之谋等二十八人。泮池左侧，与名宦祠相对称的一排三间是乡贤祠，供祀在资州出生，外地做官有功绩、美名，为乡人敬仰的人。如汉谏议大夫王褒、五官中郎将董钧、宋状元中书舍人赵遵、丞相卫国文定公赵鼎、太僕黄泽、汉中教授陈祖禹等二十四人。

忠孝祠，在文庙西面，供祀本地的忠义孝悌之士。如周大夫苒宏、明御史周冕、孝子龙海孙等十七人。其内还附有昭忠祠，供祀为保卫乡里而英勇献身的兵士、民壮郭俸等四人。

节孝祠，在文庙东面，供祀本地贞节妇女、盛道妻赵媛姜等四十一人。忠孝祠和节孝祠原都在文庙红墙外面，解放前便已无存。

文庙里面，除孔子有石刻像外，别的人供祀的都是牌位。这些牌位，解放初便已全部撤除。文化大革命中，除捣毁了孔子像和“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石碑外，其余均完整如前。

综上所述，文庙集我县古代建筑、雕刻和碑刻书法的精华，体现了我县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现今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理应很好加以保护，让它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一）侑——音Yi，古时乐舞的行列。

（二）甃——音mèng，屋脊。

资中种草织席回顾及其展望

李天玉

资中种草织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解放以后，这项副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目前，资中已是全省第二位草席主产县和全国商品基地县之一。据1982年9月16日《中国财贸报》四版载：“四川资中日杂废旧物资公司2.6尺手工黄麻经线通草单人席”已被全国评选会议列为“商业部系统评选出的优质、名特产品”。其特点是：草色一致，编织紧密，边子扎实，堂子伸展，光滑流利，美观耐用。资中种草织席一九八一年出了书，并上电视。

一、源流考证

据《四川通志》记载：“资州直隶州产席”。又以《资州直隶州志》录述更详：“灯心草（一名龙须草），苗园细长直心白可燃灯，资人以其茎为席”^①。

另查得《资中县续修资州志》西汉王褒《童约》篇也有：“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②，资中男子^③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慧买时户下^④糴奴便了……奴老力索，种茺织席”^⑤的记述。

上列史料表明：早在二千零四十二年前，资人就有栽种蒲草和编织草席的劳动项目。

直到现在，资中三河公社古“锁阳城”遗址附近，沿三叉河两岸还蔓生着从古代繁衍到今天的席草。

纵观国史、方志，资中种草织席，实属我国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发源地之一^⑥。

二、发展简况

在旧中国，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束缚和天灾人祸的摧残，种草织席这项副业生产受到严重阻碍。特别是“元兵入蜀”及明朝官军镇压张献忠义军等战祸深重的年代，人口剧减，田

园荒芜。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了上下包赔、反复波折的过程。正字润、据和独裁。期，草席生产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致使这个草织席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县，解放初期的生产量急剧下降。

新中国建立后，资中草席生产有所恢复。但在1962年以前，此项副业尚未列入议事日程；当年全县仅有灯草面积50亩，商品草席4,819张。

为了发展经济，县供销社及日杂经理部于一九六三年经过调查试点提出了“在田多土少，劳多地少的社队，利用收过中稻后的冬水田增种一季灯草，因地制宜、由点到面地逐步组织发展草席生产”的意见。1964年7月廿日，县委农办和县委财办以〔64〕财办联字第052号文件联合批转各区社，号召“研究贯彻执行”。

从此，在各级党政的重视支持下，经过供销社职工与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资中种草织席这项副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稳步地恢复发展起来。

1981年度，全县收割灯草面积12,000亩，供销社收购草席177万张，价值400万元。

三、前景展望

资中种草织席不仅有传统经验，而且现实的有利条件也很多。以土质而言，全县42万亩水田，有百分之七十适宜栽种灯草。

据调查，高楼公社裕丰二队实行科学种田，1980年栽种灯草17亩，单产1,948斤，每亩织席产值608元，纯收益295元；利用收过灯草后的水田复种一季杂交稻，亩产黄谷750斤，实现了粮丰草茂，增产增收。事实说明，这项副业经济效益高，潜力大。

草席是广大群众喜爱的传统生活用品，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经久耐磨。在我国气候温和的南方，可以常年用作垫席，北方则作夏令凉席。由于草茎富有弹性，且能沥汗，表皮光洁泽润，用作卧垫、坐垫，则觉冬暖夏凉，爽适宜人，又能避免风湿侵袭肌体。城市人民节假日在公园郊游时用作垫席，干净利落，别具风格；人们在江河游浴时以之作临时棚盖、地垫，更觉妙趣横生。

全国草席年销量5,000万张以上，我国黄河以北基本不产草席，以往多数年份都是产不足销的俏货。但是，近年来沿长江几个省在竞相发展，1981年总产超8,000万张，目前显得积压难销。然而，市场仍有潜力可挖。北方某些地区有时还在脱销宽草席。加上1982年产区普遍收缩和灯草栽种面积大幅度减少（本县仅栽1,500亩，全省从10万余亩下降到约3万亩），当前的滞销困难，显然是暂时现象，估计至迟后年会变俏。

资中草席早已行销山东、河北、河南、陕西、东北以及京、津、沪等十三个省市的一百多个县市，且曾出口远销东南亚及非洲等地。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草席需要量必将上升。因此，今后仍应坚持“粮经并举、因地制宜”的原则，稳定灯草种植面积，提高草席质量，增添适销对路的规格和花色品种，注意市场信息，积极推销，相信种草织席这门多种经营项目，前景肯定是可观的。

附注：

①、引自《资州直隶州志》食货志物产篇。

②、西汉宣帝刘询神爵三年为公元前59年。

③、班固《前汉书·本传》谓“王褒字子渊、蜀人”。《元和志》及《广舆记》均肯定王褒为资中人。墓在宁国寺侧。